

# 阳谷文史

1991年第1辑 (总第21辑)

阳谷县政协文史科编印

1991年9月

## 目 录

抗日战争以前的范筑先将军.....	周云章	1
青幼年时代 (1881—1904) .....		1
马厂练兵 (1904—1913) .....		3
调防上海 (1913—1929) .....		7
投西北军 (1929—1931) .....		14
山东赈灾 (1931—1932) .....		16
初任沂水 (1932—1933) .....		17
调任临沂 (1933—1936) .....		24
督察六区 (1936—1937) .....		40
附注 .....		47

编校：李印元 郑清明

## 抗日战争以前的范筑先将军

周云章

### 青幼年时代(1881——1904)

范筑先将军系山东馆陶县(现改属河北省)南彦寺村人,生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十一月廿一日,他父亲叫范廷云,母亲胡氏,他的原名叫范金标,字夺魁,有一个弟弟叫范金润。于1906年和本县常儿寨武氏结婚,范筑先将军希望她成为治国之材,给她起了个名子叫武治国,1938年抗日时期在鲁西北根据地担任妇女救国会主任。她生了6个孩子,2男4女(注1)。

范筑先将军幼年时家甚贫,仅有坟地2亩半,没有房子,借住本村武家一间房子以安身。他父亲当经纪,有时给地主当短工,母亲纺花织布,以维持生活。当他9岁时,他父亲送他在本村义学(注2)读书,由于家很穷,上学不容易,在他父亲的教育下非常用功,每到秋夏散学时,在拾柴割草空隙时间,他总是手不释卷,背诵在学校学习的功课,所以成绩比较突出,在学校没有受过责罚,没有挨过“戒尺”。义学老师叫张老炳特别喜爱他,同学们也非常尊重他,为鼓励他进步,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号叫“夺魁”,意思是希望他在考场中夺众人之首。

他在义学读了四年书,念了《百家姓》、《三字经》、一部

《论语》、半部《孟子》，当他13岁的时候，他父亲因饥饿贫困得了病，请不起医生，吃不起药，硬硬的靠死了，只剩下寡母一人抚养3个幼儿艰难度日。他是长子，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母亲干活，除耕种那2亩半荒地（实耕地不到2亩）外，只有靠寡母纺花织布以糊口。范金标虽小，但非常勤苦，天不明即起，夏季割草，冬季拾粪，卖给地主，以补助生活。他15岁时，给本村武天祥拉小车去河南淮卖粮食，来回七八天，可得雇金1串钱。18岁成年后，又给别人推小车来往于朝城、临清之间，每趟可赚3吊钱。到20岁以后，他比别人更能吃苦，别人推3斗，他推1石2。

他很孝顺，在父母跟前很服手，父母叫干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闹过别扭，讨过价钱。尤其他父亲死后，他在寡母跟前奉养备至，只要看母亲有一点不高兴，他总是想一切办法来安慰她，好的东西叫母亲吃，他吃的糟糠。有一次从临清推小车回来，路过柴堡集（距南彦寺12里）打尖，别人都吃得饱饱的，他买了1斤馒头放在车上没有舍得吃。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我省了这顿饭给俺娘买1斤馒头，她在家可能还饿着呢！”他煞了煞腰挨着饿一直推回家。他每次推车外出，总是推的粮食多，化的盘费少，结余点钱给母亲捎点吃的，附近各村都知道南彦寺后街有个孝子。

清末时代，政治上的腐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激起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在山东馆陶堂邑一

带宋景诗曾发动了农民起义，在邱馆边界有小白旗造反（小白旗是一种迷信会门，杀富济贫，把南彦寺地主张殿臣的粮食打开分给了农民），这些都给范筑先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他的年纪虽小，报国之志是很大的。

1904年是一个大灾年，赤地千里，将粒未收南彦寺村的人，饿死的饿死，逃走的逃走，推小卒已经不能维持生活了。眼看全家人都要饿死，适逢威县一位姓尚的给北洋军招兵，他奉母命到了天津马厂投军从戎。他临走的时候，母亲把他叫到跟前说：“金标，你去当兵一定要好好地干，不要怕吃苦，不要贪便宜爱小钱。人家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当了兵可不要染上一身坏习气，成了兵油子，辜负我对你的培养。千万不要忘记咱们是穷人，人穷志不穷，要给穷人争一口气。过去我常常给你讲的宋朝岳飞的故事，‘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你记在心里，这就是母亲对你的嘱咐。”他跪在娘跟前说：“我一定听她的话终身不忘。”就这样辞别了母亲，往马厂投军去了。

（以上材料是南彦寺农民、78岁老人范树丰口述）

### 马厂练兵（1904——1913）

到了马厂，分配到陆军第四镇炮兵第四标第三营右队第一棚当了备补兵，备补兵的任务是打扫院子、厕所、室内外卫生等零星事务，待遇每月3两3钱。他每天总比别人早起半小时，把工作完成之后，随队

出操。当了几个月的新兵，把腿都练肿了，但始终不懈（和他一同当兵的几个同乡因吃不了苦都跑回家了）。约半年的时间，上级看他勤学苦练，才提拔他为正式副兵，当了副兵之后，并未减轻自己的任务，各补兵的工作仍自觉的去完成。

他从小就养成好学习的习惯，入伍之后更努力，他白天不睡午觉，写大字 练习书法，晚间待吹熄灯号后，他把墙内挖一小洞以遮光，并用黑布罩起来点着蜡烛，阅读军事书籍 和经典等，一直到半夜，长期坚持不断。除自己学习外，还帮助别人学习。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他们全棚建立了一个学习制度，点名以前每个兵学习两个生字。他这样提倡学习，他们端正目很高兴，因为大家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浪费的就少了，不几个月的工夫全棚士兵都认识了不少生字，有的可以写简单的信了。以后又建立写大字制度，他带头学习，自任教员，全棚对他很尊重，他们每3个月考试一次，他总是名列第一，他们全棚总是得到集体荣誉。

营管带田友发发现了范金标这个新兵吃苦而劳，学习刻苦，即把他调到本镇随营学校学习（2年毕业）。在随营学校里，他的学习和工作更突出多次受到表扬，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所以他只学了1年半，即被提前挑选出来回本营本棚当了正目（即班长）。他当了正目以后，领导全棚不仅学习好，其他工作也比较突出。他把全棚分成三个学习组，第一组每天识字四、五个，第二组2至4个，第三

组比较笨，每天识字两个。他自己以身作则，坚持不懈地学习。不到半年时间，第一组即可以写信了，其他组也消减了文盲。除学习外，全棚提倡节约，每月每人储蓄2至5元，寄回家去。他领导的这个棚没有闹事生非的，没有违犯纪律的。因为他领导的有方，中队长叫他兼任全队的教习。1905年北洋陆军派人到各镇检阅，该中队考核取得了第一名，这与他领导教学是分不开的。当年他即被提升为本营右队司务长。

他当司务长时，全连伙食改善得特别好，每月公布帐目，财政公开。因为他学习好，有文化，全队的教学仍由他兼任。他的工作抓得很紧，学习也抓得很紧，每晚十一二点还不休息，盘仿改字，定分评语，有未完成学习任务的，他总是善言相劝，一丝不苟。每天他总比别人起得早，很认真地检查内务，并经常代理队长检查棚子，出早操，不辞劳苦，关心士兵。因此，他上下关系都很融洽，在全队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很尊重他。

当了司务长以后，他的收入富裕了，不忍母亲在家受苦，于1907年把母亲接到马厂。他每星期六回家，铺床叠被，嘘寒问暖，侍奉母亲无微不至。他的孝名很快传遍了全队，为大家所敬仰。

北洋军阀为培养下级骨干，在天津韩柳村开办了一所陆军讲武堂，2年毕业。范司务长被选派去该学堂学习。1908年毕业，即提升为本队第一排长，全标连以上学才班的教习仍由他

担任。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欺骗他们，说调到河南去打秋操。他们第四镇开至河南南部，才发觉不是打秋操，而是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了，闹的士兵们糊里糊涂。打了第一仗后，才从敌方了解到，这是辛亥革命军反满清统治。范排长富于民族思想，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久怀不满，推翻满清和建立民国正是他的宿愿。现在打革命军，他思想上很不愉快，幸而只打了这一仗，第四师又回原防。经过这一次战斗，士兵们受到革命军的战场宣传，回到马厂后，大有暴动之势。上级发现了这种情绪，乃采取了紧急措施：凡是参加武汉战役的士兵和部分军官，遣散回家，每人发给3个月的饷金。范排长也在被遣散之列。由于他平时工作好，田管带把他留下了，在营里闲住了一段就升为第七连长（第四师回马厂后，镇改为师，协改为旅，标改为团，管带改为营，队改为连）。

这一个连是第四团留下的约百余人编成的，这百余人很难带，他们认为自己有功劳，为上级所信任，老大骄傲，自由散漫，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范任连长后，首先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然后对症下药，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教育，以个别谈话和集体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将大家说服了，士兵们做到了按时上课 上操，出入请假。他每天点名3次，好的表扬，违犯纪律的当场批评。凡外出不请假的，叫到自己屋内，让他端端正正地立正站着，一讲道理就是一两

个小时。士兵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范连长来谈话。”由于他能以身作则，处理问题正确，全连的官兵又怕他又敬他，所以不到1年时间，这个调皮捣蛋的连被他整顿为最好的一个连。

### 调访上海（1913—1929）

1913年第四师调上海，次年他即提升为炮兵第一营长，驻防高昌庙。上海是一个繁华的地区，凡是驻该地军队没有不受那种腐化堕落思想影响的。唯范营长管理部队十分严格，建立了请假制度、学习制度、储蓄制度，生活管理很有秩序。每天早操，他总是先部队到操场；每天晚上，他必亲自到各连检查一遍是否有夜宿不归和闹事生非的。他管理的这个营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地群众都誉之为“柳亚子军”。

他公私分明，一尘不染。过去，当炮兵营长是一个肥差，除正薪1百两银子外，每月还可节余5百两公款，一般即归营长额外收入。而范营长一丝不苟，凡节余的公款统统作为整理马具、购买图书、救济贫困、修理营具之用，他分文不沾。他弟弟因在南方水土不服回原籍，给他要钱安家，他说：“我每月只百余两薪金，只够全家开支，那里有节余的钱。”他弟弟说：“一个炮兵营长每月有5百两的收入，谁不知道？”范营长很严肃地对弟弟说：“节余的钱是公家的，岂能归个人所有？”他的几个老朋友梁仁齐、周秀



章等，偷偷地给凑了4千元，背着范营长给他弟弟，让他回原籍安家去了。

范筑先不爱女色，也不像一般军阀娶着三房四妾，把妇女作为玩弄的工具。1919年7月间，他当营长时，同乡张维玺（在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当营长）从湖南到上海治病。由于他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多年不遇，所以招待备至。有一天他的几个老朋友梁仁齐、周秀章、蒋佃杰、李德和我等六七人，撺掇他请客。在远东饭店吃完饭以后，看周信芳的《月下追韩信》。看完戏已经12点了，大家认为这样还不够热闹，有人提意去“叫条子”，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夜。范营长不同意，可大家推推拉拉一起到了旅馆，并起哄说：“主人先叫！”范坚决不干，梁仁齐说：“这一番好意叫你给吹散了。”周秀章拿着一张纸到他跟前摆，大家逼着他非叫不可，他被迫在大家劝说下叫了一个妓女。这样，大家才分别活动。他在茶房借了一本书，坐在灯下看起来，这位妓女看他那样严肃的态度，很恭敬地向前施了一个礼，问道：“大人，你为什么现在还不睡？”他对妓女说：“我有病，只能看书，不能睡觉，你先去睡吧！”妓女看他睡不着，也不敢去睡，陪着他在旁边坐着，一直到黎明。范营长很和蔼地问那个妓女：“你是那里人？有父母吗？有兄弟姐妹吗？为什么投入了？”妓女把她的身世都向范营长说了，一边说一边哭，痛恨自己的遭遇不好。范营长安慰她说：“你们都是良家闺秀，为

贫穷所迫才卖身以求生存。我也是个穷人出身，很同情你们的痛苦。我给你30元大洋，你可以寄回家去。”妓女不敢收，范营长劝她把钱收下，并把全部住宿费统统算清结帐，天未明就离开旅馆回兵营去了，妓女含着感激的眼泪叫了一声：“大人再见！”天明，我们几个早漱毕找范营长，茶房说：“他一夜未睡，已结帐回去了。”大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柳下惠”。

1918年他提升为第四师参谋长，该师师长陈乐山为拉拢他，在苏州物色了一个美女，年仅18岁，很漂亮，名叫迎春，派副官用汽车送到范公馆，见了范参谋长说：“我们师长送给你一个美女，请你收下。”范参谋长很惊讶，他考虑不收不仅让师长难看，而且对这个女子也不好（这个女子已经付了身价，退回去不知落到谁手，影响这个女子的终身），不如权且收下。于是对副官说：“请你转达给师长，多谢他的美意！”副官走后，范参谋长问了这个女子的身世，了解到她家贫无法生活，父母都有病，无钱治病，因此卖身给父母治病。范听了很酸心，很同情她，马上从家里拿出1百元对这个少女说：“再给你1百元，你回家侍奉你父母吧！治好你父母的病，还可以拿这些钱去上学。”这个少女感动地流下泪来，马上跪倒在范参谋长跟前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人的恩情，大人救了我，又救了我的全家，来生变犬马来报答您的大恩吧！”范参谋长扶起她来，叫她快走，那个女子说：“老爷！你的名子和

住址我得记下来，以便日后报恩。”范参谋长说：“不用了，我是军人，住址不定，你走吧！”这个女子仍踌躇不敢走，并问：“是否还叫我坐汽车走？”范参谋长领会她的意思，马上让自己的女儿雇了一辆人力车，付了车钱，让她从后门走了。这个女子一边走一边往后看，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这一段是范晔清提供的材料）

他当了旅长之后，不少人撺掇他娶一个姨太太，并对他说：

“陈师长从苏州给你物色了那样好的一个美人你不要，你要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帮忙。”他说：“我这样大年纪了，孩子已经大了，搞这些干什么？拿别人的痛苦供自己享乐，玩弄姨女，我不干。”并很诙谐地说：“把帝国主义都打倒，我娶一个外国姨太太。”

1917年冬，该营奉令调防浙江嘉善。他们开拔的那一天，高昌庙一带的群众、学校、机关、团体，如同过年一样地锣鼓喧天来欢送他们，给范营长送了万国旗、万民伞，以及金鼎银盾等，各商店路口都摆酒桌，爆竹连天，给范营长送行。范营长和欢送群众最后拱手告别，说：“我身为军人，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民，大家对我一番盛意，我受之有愧。”在一片欢呼声中告别了上海。他走了很远，群众还翘首相望，依依不舍。他走后，地方上留下了一个谚语：“炮兵营长，每月5百两，干了3年整，没剩半分两。”到了嘉善不久，即提升为师参谋长。1920年第四师成立了一个补充团，范参谋长兼该团团长。1924年提升为第四师八旅旅长，晋

中将衔。江浙战争开始后，他担任浙沪联军第二路前敌指挥。

江浙战争是1924年7月初全面开始的，范旅长的任务是负责堵击齐燮元部第三路宜兴一线，在宜兴白阎山和齐部接触。白阎山有一个山口很险要，齐部一万多人夺此山头，可范旅长率部捷足先登，并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后来，他派其主力迂迴其后方，使齐部腹背受敌，全线被打垮，后退70余里。在这一带，双方相持约半月之久，浙沪各路都取得了胜利，齐燮元节节后退，眼看就要全线溃败，他急电求援于吴佩孚，吴从7个省调了1个师9个混成旅增援江苏。卢永祥看形势不利乃收缩战线，集中兵力，又坚持了10余天，于8月初旬已打得弹尽粮绝（卢派人在上海和美商交涉，以20万现金购买弹药，美商逃之夭夭，把钱骗走了），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紧急情况下，在上海龙华寺召开军事会议，征求各师长意见，陈乐山（第四师长）首先不主张打了，他说：“仗好打，就是没有子弹，赤手空拳没法打。”他的主张影响了其他将领，皆默默不言，卢在无可奈何之下乃通电下野，搭火轮跑到东北去了。当时，陈乐山委第七旅长夏兆麟为第四师长，夏不就职，又委范筑先替代第四师长，范也不干，陈丢了部队逃往大连去了。

这时，孙传芳部下一个师长叫谢洪勋，是孙的前敌总指挥，系山东冠县人，与范是近同乡。他以同乡的关系在嘉善用电话和范旅长通话，他很恳切地劝范旅长说：“咱们是老乡，孙总司令和周副

人给你带信（孙在前清时担任过第四师随营学堂的教官，四师的军官不少和孙相识，四师官兵大部分都投了孙），请你把队伍整理一下，全部带来吧！你的原职不动，并给你宁波镇守使。”范旅长在电话上很直快地回答说：“我不去了，你的好意我很感激。”婉言拒绝了他。谢误认为封官太小，紧接又来一电报。其大意：××乡兄勋鉴，忝属乡谊悠关，极感欣慕，顷奉孙统帅面谕，请兄迅速收容江浙联军官兵和武器，集中松江附近，给养餉需，由我方备发，授兄为第四师长之职，所有官兵原职不动等语。范接此电报后，亦未表示态度，复电如下：××师长麾下来电敬悉，此特复。

范旅长的第八旅辖十五、十六和补充团3个团，一个炮兵第一营，除补充团战斗损失较大外，其余皆保持战斗实力，如收拾残局，完全可以集中万余人以做投降的本钱。但他不愿那样做，他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有节气的人，宁可解甲归田，也不做投敌失节之事。他当时考虑（事后他当面和我谈），如继续打，一来兵心厌战，二来众寡不敌，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势，再者打这种仗对国家对民族没有什么意义，只有丧失无数官兵的性命，蹂躏地方，给国家给群众造成损失。于是，他决定也采取陈师长的办法，解甲归田。考虑妥当，他马上召集了营以上军官会议，说明残局无法收拾，让他们“各投其主，自找出路”。所存的官兵餉项，着军需官王小亭和耿副官负责，一律发给官兵个人，并严令不许克扣兵站的面粉

等食物，都分给有家属的官兵。这些事情办完以后，十六团投编第二师龚师长麾下，其余部队都投编孙传芳，还有一部分溃散跑到上海，有的跑到租界被外国人缴了枪。

刚失败那几天，范旅长接到十几万官兵伤亡抚恤金，他捧着十几万的款子回家，他夫人问他：“这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他说：“这都是咱们的钱，在家好好地看着，千万不要动。”不几天，范把这十几万全部都发出去了，他并没有乘此混乱局面捞一把。（据范萍清讲，她亲见家里窗口内桌子旁有两个过去范的随从，一个拿名单，一个数钱票，窗口外有一队人按顺序一个一个地领款，并听到他父亲说：“我这一份款不要了，也分给弟兄们吧！”）钱都发完以后，他夫人问他：“这不是咱们的钱么，为什么都发给了别人呢？”他说：“这都是公款，不能动用分文，我叫你好好保管着，恐怕你从中拿钱。”

范旅长遇险之后，为表示其志坚如松，品清如竹，把名改为筑先（原是竹仙），道号松竹道人。不久，被福建主席李厚吉聘为教导团长，由于李团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倾轧排挤，实难容忍，即辞职不干，仍居上海。

他在上海前后住了3年，每天写字、画画，看古书，学英文、代数、几何，一早一晚带着孩子练太极拳、太极剑以锻炼身体。除

了和梁仁齐、周秀章等老朋友交往外，与外界没有来往。因为没有积蓄，粗食布衣勉强以维持生活，以后逐渐变当东西，把群众送给的金鼎银盾都变卖了，最后到了穷途末路，不得不靠借贷来维持生活。

五卅惨案发生，激起了范将军的爱国热情，他再难以在上海安居了。1929年秋天，他的同乡张维玺在陕西汉中当镇守使，约他到那里帮助工作。他把全家都送回原籍，自己孤身到汉中去了。

(以上材料部分是我亲眼所见，部分是范晔清、范树琨口述)

#### 投西北军(1929——1931)

1928年韩复榘倒戈，张维玺率领他的部队退守汉中，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范筑先将军到了汉中，张就聘他为高级参赞。由于他博学多闻，品德高尚，到那里不久即为全军所敬仰，名义上是参赞，实际上是担任参谋长的任务。张维玺和他是同乡又系同学，感情甚笃，他们同心协力将范训练部队的经验和西北军原有的优良传统结合在一起，把这几万健儿训练得象铁军一样。1930年冯玉祥联阎讨蒋，把西北军又重新组织起来，命令张维玺部挥师中原，截击蒋。张把王志远一个旅留镇汉中，张和范参赞率精兵4万脱颖而出，出太康，下南阳，直扑许昌，切断了京汉线，逼使

蒋 不得不退守漯河。这时冯玉祥委张维玺为讨蒋南路军总司令，范担任参谋长，指挥吉鸿昌、高桂滋、孙殿英等部在扶沟、柘城、漯河、许昌一带和蒋 相持，每次战役都取得胜利，逼着蒋介石不得不亲临前线指挥，在漯河之役险些被俘。由于冯玉祥战略上失败，张学良出关援蒋，影响了整个战局，南路军吉鸿昌部梁冠英首先投蒋，孙殿英、高桂滋等部见势不利退到河北清华一带（以后投了蒋），只有张维玺部退守新郑，蒋介石倾全力几十万人把新郑团团包围。蒋派人劝降，当时内部分两派，倪云升主降，赵凤林主战。张和范筑先参谋长商量，仗是不能打了，一来冯玉祥垮了，讨蒋的旗子倒了，再打下去得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能突出去，牺牲一定很大，这些牺牲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二来，如为避免无谓牺牲而受编投降，这种讨蒋而投蒋的失节行为绝对不能做，“誓死不能投蒋”。最后他们俩换了便衣离开了部队，化装到了天津（赵凤林也离开了部队，倪云升收拾残局投了蒋，整编后，蒋看倪没有气节便把他踢开了）。

范筑先将军到了天津，住在张维玺家，每天和在上海一样看书写字，打太极拳，一直住了将近1年。但寄居张家终非长策，1931年10月，经张介绍到了山东，韩复榘委他为省府参议。

（以上是原第六区专署秘书张墨林的材料）



## 山东赈灾（1931—1932）

1932年夏天黄河决口，泛滥成灾，鲁西南菏泽、济宁、嘉祥、巨野、郓城、曹县、单县、定陶、鄄城、成武等十几个县成了一片汪洋，人畜庄稼损失奇重，老百姓无家可归。韩复榘为收买人心，乘机抓一把，成立了一个赈灾委员会，选范筑先为主任委员，想利用范来达到其贪污的目的。有一天，他回家后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夫人看他不高兴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莫非孩子惹你生气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省府人员在国难当头，灾情严重，老百姓将要饿死时，让我和他们一同贪污，我决不干！头可断，志不可屈，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他真是“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

赈灾是一件很艰巨很细致的工作，可又是容易营利舞弊的机会。范参议大公无私，凡是赈款、赈物都亲自掌握，避免产生流弊。他的工作也是很深入细致的。到了灾区后，他首先配合政府挨村挨户进行调查，根据灾情轻重造具灾户名册，经过复查之后再按册发款，发款时本人一定画押签收，不许代领，发完之后向群众公布帐目，以便家喻户晓。他唯恐有漏洞，又作了第三次复查，约20多天不分昼夜地深入灾区征求灾户和群众的意见，真正做到了“赈款到户，群众满意”的要求。由于灾情严重，赈款不足，范参议把他的薪金

和平时节省两三元都拿出来放赈了，甚受群众爱戴。

在菏泽赈灾时，曾遇到这样两件小事：他到某村去赈灾路上，遇见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孩正在泥泞中行走，人小泥深，寸步难行，范参议下了马把孩子驮在马上，自己拔泥涉水把孩子送到他家的村边，待孩子跑回家告诉他父母。出村答谢时，范参议已骑上马走远了。又有一次，到某村复查灾情，中途有一水沟，有一两丈宽，水深及膝，正在渡河时，有一位青年妇女来了，无法渡过。这次范参议是步行，没有骑马。他看到这位青年妇女很为难，便向前对她说：“我把你背过去吧！”这位妇女有点封建，忸怩不同意，范参议很和蔼地对她说：“你看我这样大的年纪啦，和你的父亲差不多，父亲背孩子有什么关系呢？”就这样把她背过去了。这虽然是两件小事，但以慈父的精神对待妇孺是值得学习的。

(以上是范晔清、范树琨和馆陶县志的材料)

### 初任沂水(1932—1933)

国际国内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蒋介石集中几十万军队打内战，日本占领了东北，又搞华北五省自治。富有民族思想的范筑先将军怎能在参议室内闲坐下去呢？他找到韩复榘，要求做一点实际工作，韩就委他为沂水县长。

沂水县背靠沂蒙山区，是土匪出没之地，大股的有刘天增、石

登福、李朋钧等，都在1千人以上，小股土匪不知有多少；闹得民不聊生。韩复榘派其八十八师展书堂坐镇该县，欺压勒索老百姓不亚于土匪。过去的政府，除了刮地皮以外，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逼得老百姓大量地参加会道门——黑旗会，以抵御匪患。当时黑旗会的口号是“凡入会者可以避免匪患”。在香水峪黑旗会消灭了石登福匪数百人，群众真的相信了黑旗会的人可以刀枪不入，参加者更多了。范筑先县长到任后，虽然知道黑旗会系迷信组织，但它能抵御匪患，解决群众的痛苦，所以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方针，曾在县府请过参加香水峪战斗的部分会员，以资鼓励。因此，黑旗会的发展更快了，甚至民团也参加了会，香堂林立，守望相助。本地小股土匪销声匿迹，不敢活动，外地土匪不敢进扰。1931年匪患基本上肃清了。

(以上是赵仲璞的材料)

会道门的发展解决了群众和土匪的矛盾，但会道门和官府以及驻军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多次和军队冲突，造成了军队不小的损伤。它还包围了梁水村，枪挑了七区区长，在二区四官庄打着抗粮抗税的旗帜集众闹事。四官庄位于县的东北部，距城70里，二区区长王子衡因此事到县里告急。范县长认为，这都是良好的农民，只要开导开导就可以解决了。一天，范县长仅带了为数不多的人出

发到北乡一带，目的是安抚老百姓，不料到了四官庄，被会众包围起来，用枪头子指着，情势十分紧张，幸而有人出面解围，范县长才脱了险。这是袁传当时的一件事。

会道门声势浩大，扬言要“先打沂水县，再攻济南城，直下北京坐天下”。展书堂几次企图围剿镇压，一到县里商议，范县长总是本着爱民的精神，主张说服群众，和平解决。在他们争执不下时，他便说：“须奉主席之命才能办”，其主要目的是阻拦他们的行动，或者希望韩不准他们这样做。1933年六七月间展书堂坚决要进剿，范仍主张和平处理，将会道门编成一个地方旅，引之于正途，使其担任地方治安工作。在双方意见不一致时，范县长进省府面见韩复榘，陈述己见。不料，就在这时，展书堂调了两个旅进行围剿，于7月上旬将会道门都围到黄石山，不分男女老幼，数千群众悉数被杀，惨绝人寰，造成了有名的黄石山惨案。范县长身为一县之长，不能救人民于水火，遭到如此惨局，终日在县里长吁短叹，怨愤已极。他原有咯血症，因惨案发生，病势严重，屡次电请省府请假治病，有一天，曾打过两次电报，终于使韩复榘同意他的辞职，于8月份离开了沂水（赵莲塘接任）。韩自知黄石山案件措施失当，力慰范公，不久即提升他为临沂县长（沂水是三等县，临沂是一等县）。

(以上材料是现任沂水县副县长李钦明〈当时政府职员〉和沂水县人范的秘书处长张孟龙提供的)

过去，地方驻军（特别是一个师长）住在那个县，就是那个县政府的太上皇，说什么就得办什么，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军队和县政府的来往公文都是上下级关系。县长为保住他的宝座，无不曲意逢迎，奴颜卑膝，而范县长到任后就不买他们的帐。有一次，范县长到省里开会，展书堂的母亲做寿，向县政府要几桌宴席的细瓷瓷器，还要好酒10坛，猪肉几百斤等。第一科长刘佩之（县长出差，第一科长 代行）甚为难，送则无处开支，不送军队坐催很紧，展书堂看政府未届时送来，大怒，让他的护兵到县政府抓走了管理人员，绑在树上用鞭拷打，恰巧范县长从省里回来，听到刘佩之的汇报，没有吃饭就大踏步地到了展书堂的师部（住盐店），正言厉色地责问展书堂：“我范某一生从未贪污过人民的财产，我是两袖清风，问心无愧，你驻军在此给老百姓做了哪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你是军人，我也是军人出身，军人的职责是为国为民，你反伸手向老百姓要东西，你懂得老百姓的疾苦吗？你是以你的心度我的腹，那你是弄错了，我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就是不能给你！我站得稳，立得正，你不服气可以去省里告我，你打我的人，是看不起我这个小县长，我当旅长时还没有你呢！”愤怒而回。展书堂东西没有要到

手，又给范县长道了歉，赔了不是，从此以后展书堂对范县长很客气。每逢部队检阅，总是请县长参加阅兵。

(以上是范晔清的材料)

当时沂水县有共产党的活动，范县长是明白的。他对共产党的为国为民、英勇牺牲精神是十分敬佩的，只要有机会对政治犯是采取掩护的方针（有人诬蔑他，说沂水13个共产党员被杀与他有关，与事实不符见注3）他在沂水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县政府教育科长，叫郑耀南，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沂水县组织让他破坏的不少，他当了教育局长之后，掌握了县的大权（第三科长郑佐衡是他的弟弟，还有一些区里干部是他的亲属和朋友），外号叫郑沂水。当时，党决定把他铲除掉，否则沂水组织无法活动，那时县委书记是谢梅村（化名李曼之），组织部长王光华（现名），党决定王投考本县师范学校以便在该校进行党的活动，经考试录取，榜已写好了，教育局长到了学校，见了榜上有王光华的名子，马上叫学校另换新榜，把王的名子除掉了。这件事很快传出去，教育界议论纷纷。在教育局工作的一个小职员，有一天正和他的同事谈论此事，并且很不满意地说：“此事如是我遇上了，我一定把他（指教育局长）打死。”恰巧在他背后有一个人，系郑局长的亲属，听见了。第二天，郑局长真的被人打死了。这个小职员就成了打死郑的

嫌疑犯（王当然也是嫌疑犯之一）。还有新从北京来的一个学生一天被抓起来押在监狱里，在审问他的口供中，咬出了王光华。县委知道此事后，马上通知王赶快离开沂水，把放在王家的文件赶快运走，以免抓住证据。王不同意走，他对县委说：“把文件运到50里以外，没有任何证据，怕什么？如跑了，反证明属实。”当时范县长揣测可能是共产党搞的，他估计王可能是共产党员（郑把王的榜上的名子除掉后，王的身份是十分明显了），所以，第二天就叫公安局把王光华逮捕了，逮捕时没有搜出任何证据。沂水县有一个特务队，是直接归省领导，专门对付共产党和搞情报工作的。他们建议把王光华也押在监狱，以便随时审讯和严刑逼供，范县长不同意，就软禁在公安局。

特务队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干的，虽然在监狱扣着两个嫌疑犯，但他们把重点都放在王光华身上。由于押在公安局，特务队没有权力来提讯和刑审，就把情况反映到省军法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案件，由军法处派专人来审讯和处理，经过3次审讯和3个月的调查，皆无结果。最后，他们向范县长提意见，要判决王光华，说他是共产党员，谋杀郑局长的主犯。范不同意，并对他们说：“判决一个人得有凭有据，你们已经调查了3个月，审讯了3次，仍无凭证，按法律的规定，拘留一个人只有1个月的权利，现在已经3个月，

我要按法律释放。你们不叫释放，你们拿出证据来！”军法处和特务队明知是王光华干的，但拿不出证据，也无可奈何。最后一次审讯是范县长亲自问的，和王光华同志谈了一些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叫他回去好好地上学，有了本领好给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业。并找了3个铺保，就这样把王光华同志释放了，这个案子就悬起来了。

(以上材料是现任总参队列部副部长王光华同志的口述)

范县长没有官架子，他很善于接近群众。有一次，他下乡回来，骑着马顺着河边走，天色已晚，看到母女二人徘徊于河岸，便下马问其原因，那位大娘说：“送女儿到她姨家去，可现在天色已晚，又无船渡河，明天再送她我没有时间。”范县长对她说：“我的马可以送她过河。”通讯员萧树俭急忙去扶那姑娘上马，那小姑娘转身躲在他娘的身后，范县长明白那姑娘的心情，就走到那老大娘的跟前，指着那姑娘说：“我的孩子跟她差不多大小，我老了，来，我扶你上马。”那姑娘很自然地让他抱上马去，萧树俭牵着马送她过了河，范县长顺着河往前步行走了。萧树俭牵马回来，老大娘急不可待地问：“小伙子！我老糊涂了，没有谢谢那位老先生，人家已经走远了。他是谁？”萧树俭笑着说：“他是沂水县范县长。”老大娘一听，手掌一合，很惊讶地说：“我活这么大年纪，换了多少县长，从未见过像范县长这样的人，真不愧为老百姓的父母官，



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以上是范晔清的材料)

### 调任临沂 (1933——1936)

临沂与郑城、费、峯毗邻，东南与江苏东海、赣榆两县接壤，西面有天险抱犊崮山区，赫赫有名的刘桂堂（外号刘黑七）曾盘据在这个地区。也和沂水一样，土匪出没无常，绑架抢勒时有所闻；这个县打官司的特别多，诉讼成风。往往因一件小事，为争输赢而倾家荡产；这个县的赌风特盛，哪一个区都有公开的赌场，因赌博而打架斗殴者每天都有，因输钱铤而走险流为匪盗者不乏其人；这个县公开种大烟，开烟馆，贩卖白面，特别和江苏交界地区，烟鬼特别多；这个县的土豪劣绅很厉害，经常干涉县政，托情说项，过去县长想贪污舞弊就和他们勾结在一起敲诈人民；这个县的驻军六十六旅李占标部也经常干涉县政，是政府的太上皇，说一不二。这个县是个甲等县，是一个“肥缺”，历任县长没有一个不和驻军劣绅勾结起来搜刮人民满载而归的，真是搜刮得人民“天高三尺”，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范筑先于1933年10月15日正式接任临沂县长。接任后，第一不拜客（过去的县长接任后第一件事是拜谒地方士绅名流和驻军首长）；第二，不应酬（县长拜客之后，紧接着是请客和回请）；

第三不馈赠（到任之后互相送礼）。为整理内部，对全体职员提出了约法三章：不准贪赃卖法，不准营私舞弊，不准结交士绅，收受贿赂。利用一切机会对职员进行爱国爱民、奉公守法的教育，在他以身作则和严格约束下，县政府树立了一种新的作风。

他到任后，没有谈什么施政纲领，也没有谈什么工作计划。他的科长问他，象临沂这样乱，今后咱们怎样办？他说：“入境不问，你就是个瞎子，等等看！”他利用一切方法来了解情况，看档案，开会议，下乡访问，发动群众来信。很短的时间，他把全县的情况基本摸清了，认识到临沂的主要问题是毒、赌、娼三大病害。这是诉讼多，盗匪多，危害人民的基本根源（当然，他还不可能从阶级观点来看此问题），因此整顿县政府要从除三害开刀。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除三害，必须先从县内所谓的地方名流开第一刀。商会会长寇清泉，豪绅钱景南等都是临沂县的头脑人物，专以结交官府为能事，各有好菜、美酒、鸦片、美人，作为结交官府和军队的交际品。过去的县长想贪赃卖法，发财致富，都利用他们作为媒介，他们这种为非作歹的行为早为群众所痛恨。范县长到临沂来了个三不政策，给他们一个闭门羹，这些人就不愉快。由于范县长浩然正气，秉公无私，他们也无可奈何。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看到范县长没有和这些人勾搭往来，政府人员也拘谨小心，改变了过去的作风。这样，就开始有人敢说话了，匿名信一封

接一封地投到“言事箱”；密告宓清泉包娼、聚赌，他一个人包着压倒城、压倒乡、压倒会三姐妹（暗娼的美貌可以压倒全城全乡全会之意），并仗着商会会长的势力公开聚赌贩毒，谁都不敢惹他。范县长下了很大功夫调查落实，掌握了宓清泉在五贤祠街南巷子“坐站”的材料，某夜调查确实，便率军警直奔五贤祠街到压倒会家搜查，宓清泉越墙逃脱，只搜出了赌具等，即把压倒会三姐妹带到公安局管押教育。又一天上午，范县长单人往访县商会。他们正在打牌，范县长很严肃地说：“商会是办公的地方，聚赌是违法，在今天的临沂县是不允许的，这次给你们留一个脸，不处理，但须悔过，保证再不聚赌。”商会的人素知范县长不讲情面，只好低头认错，谁也不敢作声。这两件事很快传遍了全城，都知道范县长铁面无私。从此之后，明令全县：凡是贩毒聚赌、包娼者一律依法严办。“三害”之风暂时平息下来，豪绅富商亦销声匿迹，不象以前那样嚣张了。

城内“三害”基本上肃清了，范县长又把中心转移到乡村。临沂县和江苏交界种大烟的很多，地主们利用土地出租，种植鸦片（地主出地佃户出力出名），以谋暴利，剥削农民。范县长了解了这种情况，亲自下乡进行宣传，使老百姓都知道三害对人民的危害，并严禁种植鸦片，已种者即刻改种其他农作物，未种者不许再种。经宣传教育布告通知后，仍有不少私种的。到了夏历五月左右，鸦片

的收获季节，他亲自率领一部分骑兵，每人带着一根长竹杆，直到城角七区（即种鸦片区），见了烟苗即用竹杆扫打，成块成块的烟田都被摧毁殆尽（收割期间最怕折断）。范县长很诙谐地对群众说：“这叫做县长收大烟。”打完之后，责令该区区长进行调查，要求悉数除掉。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种鸦片了。

临沂县六区层山乡，素以聚赌闻名。塔树结彩，开设宝局，赌局之大，日夜出入数百人，一夜之间就可以输赢万余元，有人倾家败产，家破人亡，以至而走险，当了土匪。这些宝局皆以当地豪绅地主为后盾，无人敢过问。过去的官府不仅不予禁止，反而从中牟利，不是受贿就是从中“抽头”。范县长为严禁赌风，在某一天深夜里恐怕走漏了风声，突然紧急集合，亲自率领骑兵排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奔袭赌场，把赌局进行四面包围，一网打尽，把赌徒押到公安局管教。抓了宝局之后，马上召集了该区乡村镇长开会，阐述三害对人民的危害，要求各乡镇村长保证不再聚众赌博和贩毒了，倘有违者，由他们负责。从此之后，全县的赌风也煞下去了。

解决了三害之风后，紧接着平熄了诉讼风。他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清理悬案，英明折狱。

前任县长李凤五时代的悬案累累，监狱押满了人，而新案每天不下数十起。他宵旰勤劳，面无倦色地亲自审讯，对新案规定3日内见批文，不准拖延。不够受理条件的，他都是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劝其和解，以免影响生产和浪费金钱。对过去悬案都一一采取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之后，及时地予以判处，而且判处都是很英明的。如某乡乡长叫刘孝义，有人和他有私仇，诬告他贩卖毒品，勾结土匪，贿赂公安局王警长，王勾结当地驻军（关于盗匪、毒品等治安案件军队亦管），把刘乡长逮捕了。在逮捕的时候，拿着毒品和伪造的通匪信件，说是从他家搜出来的，给他栽了赃，有人证物证，有口难辩。由于他们双方都倾家荡产托请说项，双方的财力相衡，势力相均，当局难以左右，军队就把此案移转到县府。经范县长审理，发现其中有矛盾，而且案情重大而复杂，乃下乡进行调查，从调查中发现了刘乡长“栽赃被诬”蒙冤入狱，待掌握了真情实据，一讯皆服，刘当场被释放。余皆以诬反罪处以极刑。王警长亦被判处。公安局长曹作善，因失察记大过一次。这个案子结束后，群众给范县长起了个外号叫“范青天”。

## 第二、简化手续，杜绝弊端。

1、明确传达处的职责。过去传达处的权力很大，老百姓打官司不通过这关，状子根本就递不上去。传达处没有不受贿的。范县

长到任后，对传达处作了严格的要求，并具体规定：凡有乡民求见县长的，事无大小须立即报告，一切文件及时传达，不准拒绝和拖延，故意刁难。

2、建立问事处。每日指定时间，派政警和录事各一人值班，遇有不明瞭的事情，即进行解说，或对一般的诉讼给代写诉讼状，不取手续费（以后建立撰写室，代写状子的任务取消了）。

3、发出差费，严禁政警下乡办公勒索群众。有关诉讼案件，需要传讯时，分别路途远近，在传票上标明日期，每日发出差费2角（以前没有规定，政警下乡随意勒索群众）。从特别办公费项下开支，政警不得向当事人索要鞋脚费，违者以敲诈论。

4、设言事箱。老百姓遇有受屈不能直诉的事情，或畏惧权势不敢指名控诉，以及有隐秘和其他建议等事，一块可从言事箱投送和揭发，作为保密事件处理。

第三、下乡就审，深入群众解决问题。他常说，做官的给老百姓办事，就要体贴老百姓的痛苦，就要排难解纷，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因此，他除了改革过去一些老制度、老办法以外，又建立了一个“城半月乡半月”的制度，只带着几个人下乡处理一些事情，使老百姓不必进城，免了来往路费。特别是诉讼案件，他采取了巡回下乡就审的办法，既便于了解情况，又减轻了人民负担，免受黑律

师和劣绅的剥削，而且不影响生产。这个制度一直坚持了几年，从未间断。老百姓反映说这是“包公下世”。

第四、铲除黑律师。临沂打官司的多，黑律师也就多。他们专靠刀笔来吃饭，勾结官府，谁给的钱多，没有理也可以把官司打赢，没有钱有理也得输。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黑律师叫邢文俭，已60多岁了，在绅士中地位很高，尊称他年高才富，系刀笔中之良友。他专为地主豪绅服务，从中渔利，穷人他根本不睬，经范县长几次劝告不改。为铲除诉讼风，首先把他扣押起来，予以‘挑词架讼，敲诈良民’罪名解送到省，依法惩办了。从此以后，其他黑律师亦皆销声匿迹，再没有敢写黑状子，敲诈民财的了。

第五、清理旅舍。临沂县的旅舍特别多，而且黑暗的很，什么坏事在旅馆都可以做，吸大烟、卖白面、窝藏土匪、介绍暗娼、聚赌，无所不为。他们和官府有勾结，和地方士绅名流有勾结，专门欺负和剥削乡下进城的农民。打官司、投送诉状时，要依靠他们做铺保。据说店主盖一个章，需要保金2元。他们也代打官司的农民托人情、行贿赂，但从中得剥一层皮。这些旅馆真是作恶犯罪的巢穴。范县长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下决心予以整理。凡是经理人员品质端正，遵守国家法律，营业正当者，准其继续营业；凡是投机架讼，窝匪聚赌，有违法活动者一律停止营业；虽有违法活动，

经教育悔过者，暂准其营业，以观后效。经过这一番整理，群众欢迎，坏人敛迹。

临沂县的土匪相当多的。在沂蒙、日照一带有着名的徐小楼股匪，抱犊崮一带有刘黑七的余孽，打家劫舍，民不聊生。范县长到任后，除了组织联庄会以维持治安外，他自己经常带着几十个人的小战斗队在乡间活动。由于他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方针，不到一年时间，社会秩序基本上安定下来，老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了。他对土匪盗贼不是大杀大砍，而是采取了教育感化的方针。1934年夏天，他带着贡禹代等十余人到五区去，走到大蛙村时，遇见一个小孩，走的慌慌张张，很可疑，范县长把他叫住，问他姓什么，哪里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说名叫凌作善，是凌界村人，到村探亲，现在回家。看他神色不对，在他身上一搜，搜出了两支匣子枪。经追问才承认是给土匪当通讯员的，即把他押进城内，范县长亲自审问，才知道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贫苦孩子，而当了土匪。范县长看这个孩子很可怜，便通知他家邻居的一个哥哥把他保出释放。这个孩子坚决不走，他哀求范县长说：“我不走了，就跟着您吧！我一定听您的话！”范县长看这个孩子可以培养成国家有用之材，就把他留下了，如自己孩子一样不离身边。别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土匪”。一直到抗战期间，随范司令辗转各战场，最后范司令



在聊城殉国时，他仍在他的身边。

范县长对被捕住的土匪，并不是随意杀掉，草菅人命，处理都是很慎重的。1935年夏天，刘黑七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从华北窜入山东企图回抱濮鲁老巢重建根据地，韩复榘调了重兵进行堵剿，并命令所有擒获的刘匪一律就地处决，格杀勿论，事后上报。在临沂县境捕获了刘部散匪20余名，还有刘匪的团长王玉胜，如执行韩复榘的命令，这20多人都应予以处决。而范县长以人命关天为由，没有执行韩的命令，逐一加以调查询问，大部分是被抓的老百姓，不是属于惯匪，都咨转该县取保释放了。

临沂驻军是六十六旅李占标部，他兼着该区的剿匪司令。过去，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事关治安问题，都得呈报司令部。范县长是省府参议，兼第三路军的军法官（山东各县县长都兼军法官），对军队也是一个“三不”政策。驻军过去那种太上皇的作风在政府施展不开了，所以他们心中就不服气。他们最痛恨范县长有两件事：一是过去的盗匪毒赌等治安案件都由驻军审理，他们就有机会从中勒索舞弊，敲诈民财。范县长到任后，都移到政府处理，老百姓打官司，知道范县长铁面无私，都到政府来申诉有关上报的案件，直接报第三路总部，杜绝了军队舞弊的门路，因此就怀恨在心。范县长既不贪污又不卖法，自己站得正，立得稳，军队也无可奈何！

另一件事，驻军经常借剿匪为名，到各乡镇任意索要民夫给养，乘机敲诈群众，有些乡镇村长也就混水摸鱼，从中渔利。范县长发现这种情况后，通令全县：凡剿匪部队向地方索要粮草民夫等事，不经县长命令不得供给，误事由县长负责，违者以借机摊派论。这个通令后，驻军对政府更加不满了，矛盾就更深了，处处制造借口寻机报复。乘刘桂堂入籍的机会，以夜间戒严为借口，组织纠察队封锁县政府，禁止政府人员出入。范县长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不畏惧权势，以义正辞严的态度叱退了纠察队。并向旅部讲明道理。经过激烈的斗争，军队自知理缺，撤销了纠察队。范县长用电话请示韩复榘说：“军队干涉县政，政令难推行，请求辞职。”韩马上派省府顾问韩多峰来临沂调处。韩在县府设宴约请双方进行调解（李占标系韩多峰的老部下），李向范道了歉，双方和解无事，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军队再不敢向政府逞威风了。

军队这一股毒气没有出来，地方豪绅被范县长压得也是满腹怨气。在军队的怂恿和支持下，地方豪绅暗自串通联合了一部分劣绅富商地主，共同推举会长寇清泉、豪绅钱景南等为代表到济南，向韩复榘控诉范筑先沽名钓誉等几大罪状。范县长公正无私，韩复榘也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些豪绅劝阻回来，不了了之。

范县长整顿县政，铲除积弊，特别是整顿田赋，下了很大功夫。

临沂县全县地丁每年征银4800两，每两丁银征收正税4元，其他是地方附加税（包括地方上的财政建设教育、公安地方行政等费），一并征收。正税归二科，附加税归三科，在征收正税之后，留30%的征解费，其他悉数解省。在开支这30%的征收费时，就开了县长贪污之门。按规定是一半发给征收人员作薪金和办公费，一半作为征解款项银行汇费。过去的县长不按此规定发给征收人员，而窃入私囊。征收处的一切开支只有靠收多报少，私放利贷等非法收入。范县长决心整理田赋，作了以下改革：

一、所经营的粮粮、帐簿、表册、串票等，不定期地进行审查，有隐蔽不实的，立即追缴，严重者限期变产分期交清。

二、在编造征收表册、串票和通知单时，采取四舍五入，分别区乡征银数目，造好花户串票通知单，由催粮人员通知花户，缴粮时对串票扯票发给花户，每日结算时，以实收正银多少，共收银元多少，悉数交公。

三、精简征收人员。确定了征收处的编制，设主任1人，会计事务员各1人，征收员、催粮员若干人，练习生若干人（以前没有编制，忙时人多，闲时人少），以上人员经审定后编造预算，按月发给薪金。

四、征收处经费来源。严禁收多报少，私放利贷等非法收入。

其经费来源：①留支30%办公费，②通知单费，③串票费，④滞纳金，⑤征银收入捐尾。

五、修建征收处。对上项经费收入，除开支薪金等以外，其盈余部分修建房屋，纠正过去官不修衙的恶习。

六、每日征收的田赋各款分别注明‘钞票’或‘银元’，悉数交银行存帐，不得保留和放贷，以杜流弊。

除规定了以上办法外，对征收人员经常进行奉公守法、捐滴归公的教育。因此，临沂县在征收田赋问题上给各县树立了新的榜样。

过去当县长，正薪甲等县每月230元，乙等县260元，丙等县240元，除正薪外，额外收入多倍于此。其中有田赋提成，契税提成……，还有4年1次编审（即商人承包屠宰等税）等。范县长为官清廉，一尘不染，所有额外收入悉数归公，不是修缮房屋，即办福利事业。1935年冬季，契税超额，提成约2000余元，襄事人员接过去老规矩，向县长建议，县长应多留一部分，其余贴补出力人员。范县长对他们说：“工作是大家干的，今后有奖应归功于大家。我平时无钱照顾大家的困难，提成应按全体人员薪金多寡，平均分配。”县府所属人员都受到实惠，喜形于色地说：“范县长真是大公无私。”

又有一次年终奖金，他同样地又分给了全体职员。省派来一位

委员，临走时，拍着范县长的肩膀说：“老兄，省里发给你的奖金听说你都分给了职员们，当县长就是为了钱，你却是个穷县长，连自己的奖金都不要，简直是一个傻子。”当时范县长哈哈笑着说：“谢谢你的美意，我愿一生做这样的傻子。”所以，他居官3年，仍是两袖清风。

范县长主持正义，爱护青年。1984年夏，韩复榘成立了一个剿共队，由叛徒宋鸣时任队长。在山东各县进行破坏活动。同年夏天，剿共队派了几名特务来到临沂县。他们破坏的对象是临沂五中。到后不久，即把第五中学的一部分学生和一个临沂东关在青岛市立中学读书的学生胡维廉等一齐逮捕了，共有7人，羁押在临沂县监狱。有一天的晚上，特务们正把这7个学生在县政府上杠子，灌辣子水，严刑拷打，打得学生们鬼哭神叫，惨不成声。恰巧，范县长下乡回来，刚进门就听到这种凄惨的嚎声。他没有进屋直赶到现场，这时特务们正洋洋得意张牙舞爪地逼供讯。范县长一进屋，大发雷霆地很严厉地指着那几个特务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随便在我办公室里私立公堂，拷打青年学生？”特务们认为是省里派来的，县长其奈我何，很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剿共队，是宋队长派来办公应克的！”范县长接着问：“你们到临沂县前曾给县政府有公函和电报联系了吗？”特务们回答：“我们做的是秘密工作，有

韩主席的密谕。”范县长眼一瞪，手指着这一群特务说：“秘密还能瞒得过一县之长吗？你们简直是胡作非为。在山东只认识韩复榘，你们知道保证人权吗？我没有接到韩主席的指示，你们休想在临沂县胡闹。快请出去！”特务们看到那种威严，谁都不敢作声，怏怏而去。最后有一个特务，好象是一个组长，出了屋门，回头对范县长说：“范县长既然干涉我们逮捕共产党，将来出了问题由你负责！”范县长厉声地对他说：“临沂县的老百姓由临沂县的县长来负责，用不着你们操心，今天县长不追究你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青年学生就算便宜，给我快滚！”特务们走了以后，范县长亲自给这几个青年解了绳子，很温和地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地学习去吧！”摸摸他们的头，又问他们的伤情如何，告诉他们可以去医院治疗。随后，马上叫第一科长刘佩之来，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告，随便在县里羁押人犯，审讯青年。刘说：“他们是省里派来的特务队，我不敢过问。”范县长瞪了他一眼说：“什么特务队！今后没有我的指示，谁都不准随意逮捕青年，羁押人犯。把他们取保释放！”并对这几个青年说：“今后如有人再找你们的麻烦，你们就来找我！”

特务们遭到这场无趣，并不甘心，他们马上向省里去了一个电报。当夜，范县长接到韩复榘第三路军军法处3封加急电报，内容是让临沂县羁押的共产党嫌疑犯解省处理。范县长扣下这3封电报

来了个先斩后奏，当夜即把这几个学生放走了。随后，范县长用长途电话给韩复榘通话说：“报告主席，特务队太胡闹了，既不给政府联系，也不给县政府配合，随便乱抓一群念书的学生严刑拷打，这样就把临沂县捅乱了，这样下去就无需要县长了。”又说：“这些学生无凭无据，已将他们取保释放了，如果确实有实据，再办不迟，随传随到。”韩安慰范县长说：“你既然已经审问了就算了吧！”特务们从此以后再不光临临沂县了。因此范筑先在临沂落了一个“红头县太爷”的称号。

范县长在临沂执政2年零7个月，他没有徇私舞弊，没有贪赃卖法，没有危害百姓，没有贪逸图劳。他为民造福，力除三害，肃清了土匪，使群众能安居乐业。下乡就审，给人民排忧解难，息事宁人，平息了诉讼之风，杜绝了驻军的勒索敲诈，打倒了土豪劣绅，兴利除弊，口碑载道，公私分明，一尘不染。1936年7月，他离开了临沂，群众怀念在心。

他离开临沂的那天，城乡群众为欢送范县长，都换上了新衣服，如过节日一样，成群结队辞别亲人。从县政府门口，经考楼街向东——南大街、北街——十字街向西街中间转南，再往县府前转南街，出南门直到沂河岸（这个路线是群众给划的），千家万户都齐集在送行的路线上。三五步一个桌子，每个桌子上放着一面镜子和一盆

清水，还有的桌子上除镜子和清水外还放着一块豆腐和两棵小葱，以表示范县长在临沂是清如水、明如镜，“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欢迎的群众代表从早晨陪着范县长出县政府大门，鞭炮齐响，撼动天日，每到一桌，县长都一一举杯致谢说：“父老兄弟姐妹们，再见吧！”欢送的群众也夹道欢呼：“县长身体健康！给我们清白的老县长送行啊！”走出南门，是本县中小学校的学生队伍。范县长的手抚摸着小学生的头顶很亲切地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好好地读书，读了书，有了本事，要爱国救民。你们的前途是无量的。”小学生们一齐回答说：“一定听县长的话！”学生的行列一直到送行的终点——沂水桥畔，范县长都一一嘱咐了一些鼓励的话。方走到桥头，这时兰陵山乡校全体师生（距城70里，属第八区）星夜赶来为范县长送行，范县长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勉励了他们几句话。这时已过中午，沂水县欢迎的人（张里元是沂水县长，张升专员，和范对调），已接出1百里以外，连来电话3次催问。大约到下午两点左右才到了沂水桥西岸，就在河滩上和送别的代表及群众一同照了像。当和欢送的群众挥手洒别的时候，鞭炮齐响，欢呼声此起彼伏，一片喜悦荡漾沂水两岸，男女老幼齐声同呼：“好县长在临沂万古流芳！”他离开临沂以后，在民间流传着一个谚语：“临沂水倒流，有清官不到头。”这是群众给范县长的总评。



他到沂水不久即提升为山东第六区专员。

(以上是原临沂职员王学耕〈现年60岁，在济南文具店工作〉周建国〈现年53岁〉和范萍清的材料)。

### 督察六区 (1936——1937)

山东省第六专区是1936年11月1日正式成立的。它包括聊城、阳谷、堂邑、博平、茌平、莘县、冠县、寿张、濮县、观城、朝城等12个县，是鲁西北的一部分，是山东和河北的接合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但民性很强悍，历史上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宋朝的梁山泊聚义，明朝的农民马风造反，清朝乾隆三十九年王伦农民起义，咸丰十一年冠县宋景诗起义，都发生在这里，每到社会上有什么波动或者统治薄弱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农民总是风起云涌地和封建地主作斗争。为什么1937年抗日一开始，绿林英雄揭竿而起，烧杀抢勒遍地皆匪，这有其历史根源的。范筑先将军几个月的时间收编和改编了五六万抗日武装，亦有其客观条件的。

范筑先将军任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聊城县长。专署的组织除以原聊城县职员作基础外，从沂水、临沂的旧属中带来一部

分,如李西山、刘佩之等。另外,由教育厅聘请了一部分乡建派,如赵玉波、张孟龙、朱香庭(朱是国民党CC分子,以乡建派的面目打进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如张墨林、牛连文、赵伊萍(系共产党员)、张廉芳等,由于立场不同,在专署中新旧力量曾进行着尖锐的斗争(注五),范专员是倾向于进步力量的。他以后和共产党合作抗战,走到革命的道路,与专署内进步力量的推动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范专员莅任后,他以治理临沂县的经验来整理六区,从接任到七七事变,不到1年的时间,他办了以下几件事:

#### 第一、整理县政,革除积弊。

1、清查地亩,按实纳粮,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过去有很多有地无粮的黑地,这些黑地绝大部分是地主们耕种着,这种黑地概由农民田赋税中平均摊派。范专员到任后,命令各县清查地亩,谁耕地谁纳粮,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2、核实全区军警和政府职员名额,以防虚报冒领。

3、清理悬案,不许积压案件和非法扣押;取消黑律师,严禁挑词架讼。

4、不许请客送礼,不许政府人员结交豪绅,托情说项。

5、规定政警补贴制度,严禁欺压群众,勒索钱财。

## 第二、提倡生产节约，屯草积粮，兴办福利事业。

六区很多沙碱地影响农业增产，为改良土壤，提倡副业生产，增加人民收入，在东关外开辟一个农业试验场（在铁塔附近，规模不大），聘请了有农业经验的鞭先生为指导，专门研究土质改良、沙地植林选种育苗、家畜饲养等工作，以资推广。虽然时间短，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在旧社会关心人民生产，搞科学试验还是不多的。除此以外，他反封建，破迷信。拆庙宇，兴办学校，严禁妇女缠足，提倡妇女参加生产。他为人民的健康，在济南聘请了一部分医生，建立了聊城医院（抗战以后改为军队医院），帮助当地的慈善团体兴办了不少的慈善事业。到任之后，他还通令各县屯草积粮，建立粮仓，以备荒备战（抗战初期30多个支队粮草充足与此有关），不到1年时间，确实给六区人民办了不少福利事业，人民感戴非浅。

## 第三、积极训练壮丁，准备应变。

七七事变前夕，国际国内形势相当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范专员到了鲁西北，就在12个县大力训练壮丁，以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当时山东训练民众有3种形式：一是民团组织，这是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老形式；另一种是正在各地实行的联庄会（韩多峰是省总会的总会长）还有一种是正在各专区试行的梁漱溟的乡农学校。他采用了第三种办法。他当时认为这是一种新办法，并幻想推行

这种办法或许可以救国也。不到1年时间，把全区30亩地以上的青年基本上训练了一遍（地富子弟因受不了苦，大部分是雇佣贫苦子弟代训）。七七事变后，这些乡农学校，随旧政权一齐垮了台。事实教育他幻想乡建是错误的，救国只有依靠共产党。

#### 第四、聊城抢险，万民感德。

1937年的秋天，鲁西北地区一连下了20多天暴雨。漳河、卫河、马颊河和徒骇河洪水都漫溢出来，东西1百多里成了一片汪洋。聊城地势很低，四面环水，水外是大堤，堤顶和城墙平，倘若外堤决口，聊城就有淹没的危险。在7月初的时候，大堤外的水已与堤平，范专员冒着大雨率领军政人员以及广大群众在堤上又修了一个小堤，约1·5米高。水仍在涨，雨仍在下。范专员在堤口上不分昼夜巡逻了3天3夜。水平了小堤，不断出现险工。于7月4日下午4时左右，南堤水情紧张了，堤根有一鼠洞，通堤内约两丈多远，开始由地下滴水未引起注意，后越流越大，象济南趵突泉一样向上喷水。集中全力堵塞无效，只听如霹雳一声的巨响，1丈多宽的堤决口了。城内的群众听到城南如万马奔腾的声音，知道已决了口，携老扶幼奔上了鼓浪和城墙，城内象一锅粥一样，其声甚惨。这时，范专员正在西堤，听到南堤决口，马上退守西门。西门距堤很近，人未到而西堤亦决口。水先人冲入城，待范专员退入西门，

而水深已及膝，滔滔洪流顺西门往内灌，聊城危在旦夕。这时，范专员以与城同存亡的决心站在西门洞旁，屹然不动，非把西门堵住不可。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命令他的秘书张墨林（张从堤决口处跑来西门），率领壮士40余人把粮仓打开，用米包终于把西门堵住了。已经绝望的事情，在范专员的毅力和决心之下终于挽回了危局，拯救了聊城几万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西门堵住了，南城墙和西城墙两个地下水道向城内灌水，情况亦正危急。范专员想了一个办法，在水道四周又打了一个小环堤，水涨多高，堤筑多高，使水不能外溢。这时，一方面堵水沟，一方面扎木筏，营救城关人员。在紧急的抢救下，城关群众全部脱了险。水仍在涨（已快平了城梁口），雨仍在下，聊城仍有被淹没的危险。范专员焦虑万分，不分昼夜地环城巡逻，把眼睛熬得通红，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聊城几万生命危在旦夕，我怎能休息呢？”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候，有人建议，城南四河头有一涵洞，年久淤塞，水不能东流。如加以疏浚可以解聊城之围。范专员急派第四科长郑佐衡率工程师张清濯前去勘察疏浚。把四河头涵洞挖开之后，第二天，水降半尺，聊城才脱了险。（运河东有一小部分土地疏浚后被淹没，群众意见很大，后经解释和 都予以救济，意见才消除了）。

汛期过后，城墙浸塌了5处，四关水深平均5尺，民房倒塌3000余间。范专员一方面开仓急赈，一方面呼吁各方面捐助，凡倒塌的房屋，都帮助重建，灾民的衣食等问题都予以妥善解决。

经过这次聊城抢险之后，范专员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范专员的工作仍和在临沂时一样，那样的认真负责，事无大小都得经过他亲自审阅处理。各科和秘书处草拟的一些文件，他都逐句逐字地加以修改，一点也不放松。有时提的处理意见不对，他总是很耐心地说明他的修改意见，以帮助和提高下级对问题处理的能力。他对办公制度、生活制度要求很严格，每日早晨，率领全体职员打太极拳，做早操，没有一个人敢不到的。他向来没有早下班晚上班，拖拖拉拉，连泥带水。他的工作是那样的果断和雷厉风行。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干部都是很愉快的。一般人办公完了之后，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而他回家不是看书就是写字和记日记，或者就是在他住室里来回地散步，他的爱人和孩子也不敢打扰他。

他接任专员之后，不象在临沂半月城半月乡，但他经常下去。他到各县一不住机关民宅，二不接受招待，三不个别接纳地方士绅。他对各县县长要求很严，县长们很尊敬他，但又很怕他。

他在六区确实办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所以抗战一开始他有那样大的号召力，不到1年组织了30

多个支队，约五六万人。鲁西北的人民象对神灵一样地膜拜他，这不是偶然的。

(以上是张墨林的材料)

范筑先将军是军阀时代的军官，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吏，但在旧社会里，敢于向黑暗势力作斗争，敢于为人民兴利除弊，能身居污泥而不染，可以说是一个清高廉洁，正义不阿的爱国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他不是国民党员，他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也没有什么信仰，他的信仰是谁为国为民，他就信仰谁；谁损国伤民，他就憎恨谁，反对谁；他没有什么嗜好，没有旧社会的坏习气，不吸烟，不喝酒，生活俭朴。他最大的爱好是写大字，他的大篆写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个书法家。进了他的屋，象到了书法展览会一样。他还爱好看书，手不释卷，学习精神很令人钦佩。他对任何人都是那样诚恳，没有和任何人开过玩笑，说过戏言，就是家庭儿女之间，也是国家民族长国家民族短地来教育子女。他的一切言行都可以公诸于世，他没有私念，从来没有为个人打算过，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什么享受和吃喝玩乐等。他正是象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中说的，无丝毫自私自利之心，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如从他整个

历史来评价,也足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和他在1904年马厂参军时就在一起,左右相随数十年,据我对他的了解和看法,介绍如上,有不妥之处,尚望指正。

1965·8·14

附注:

一、范筑先将军有6个孩子:长子范树中,次子范树民,长女范晔清,次女范树琨,三女范树婉,四女范树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次子范树民少年英俊,抗战开始(1938)担任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挺进大队队长,于济南战役坡赵庄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18岁。

二、南彦寺村的义学:这座义学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有几十亩义地,由前后东三街贫苦农民耕种,地租很低(每街15亩),它的收入供义学的一切开支。有一个学董会来管理这个学校,贫苦子弟都可以入学。除书籍纸张自备外,不收学费(大部分是贫苦子弟)。农忙时散学,农闲时开学,与生产季节相结合。聘请了本村张老炳为先生。学习内容由学《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改为新学制初小、高小课程。

三、沂水黄石山惨案。关于黄石山惨案,其说不一,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片面,不少都涉及到范筑先将军一些问题。本文是



根据赵仲璞、张孟龙（沂水人，系范筑先的秘书），以及李钦明（现任沂水县副县长，当时沂水县职员）的材料写成的。这主要写范县长当时如何处理黄石山惨案的一个片面。兹将张孟龙和李钦明的两封信附后。

张孟龙的信：

……范于1932年任沂水县长时，他反对韩复榘用军队屠杀黑旗会的事是这样：

1932年春季时节，沂水西乡农民抗粮抗税，组织黑旗会，据黄石山以自卫。范老此时任沂水县长，他本着他平时爱民的精神，主张说服人民和平处理。当其赴省面见韩复榘陈述情况时，第八八师师长展书堂命令其沂水运其昌旅进攻黄石山，因受黑旗会的反击，伤亡颇大。展书堂又命令驻临沂之唐邦植旅全力进攻黄石山，山上人民数千（多数妇孺）悉数被杀，惨无人寰。范老因此怨愤异常，引咎辞职。韩复榘亦自知对黄石山问题措施失当，力慰范老，并提升其为临沂县长（沂水是三等县，临沂是一等县）。范到临沂，仍反抗军队横行霸道，保卫人民利益，所以于1936年提升为第六区专员。

张孟龙

1956·8·14

（张墨林亲自听到范县长口述，他到省见韩复榘，为黑旗会事件和展书堂打官司，与此情况相符。）

### 李钦明致范树琨的信：

接来函，恳切地囑我对令尊范筑先将军任沂水县长期间，其所涉及黄石山惨案，以及某些情节的问题，进一步加以了解，以求得明确当时真实情况。

关于我对范老在沂水县的印象和社会上一般的舆论，在前信已经说过了（前信主要内容：筑先将军处于我国军阀割据，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时期，由于他的品格高尚，不同流俗，他是当时一个好的官吏，为一般人士所公认，特别是他的爱国精神和思想，这是那时的沂水各界人士所熟知的……）。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又尽量从各方面加以采访，特别几次访问了当时充当县政府的政务警目，不断在范老左右侍候差遣的，现在已经64岁的一个老人，他的名字叫贺廷贤，住家离人委不远，系烈属，人比较进步。

由于事情已隔多年，而贺廷贤在当时仅是干的一种小差事，对较重大的问题，他自然也不了解。既使对某一具体情况，也想的不多么清楚了。他对范老的印象是不贪财，对老百姓不苛刻，不污辱，是在旧社会难得的一个好官。贺当差刀会活动日趋紧张的时候，驻在沂水的师长是书堂、旅长运其昌曾屡次企图进攻围剿镇压，一到县里商议，范老便说须奉到主席的命令才能办，其目的是阻拦他们的行动，或者是希望转不准他们这样办。及到情势严重，官兵围

攻賈石山，并造成重大惨案之后，范老在县里终日长吁短叹，看样子心里痛苦极了。他原来有咯血症，自惨案发生，病情加剧，屡次电省，请假治病。有一天，为此打过两个电报给省里，大约经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离开了沂水，省派赵莲塘来，还是代理县长职务……

在你们来信内，特别提到，在那个时期，曾经一案杀过13个人，是否与范老有关的问题。我对范老的印象是，他不好杀人，人不是在他任内杀的。我记得在被杀的那13个人当中有父子两个人，因其父不能行走，叫他儿子背负着走到刑场。我听了后，非常痛心，我没有范老经手此案的一点印象。

据贺说，在范老第一任内，只有张家诸坞张焕明勾结土匪绑架其叔张四叔摆，交了赎款，又把肉票撕毁，结果匪家在逃未获，只有张焕明被获，经前县长焦长荫判处死刑，报省批准执行。而范老刚一到任即奉批准此案之省令。他曾亲到离城15里之张家诸坞进行查访后，才枪决的。杀害那13人，贺说是赵莲塘任内的事。有人说是张里元任内作的（赵在沂水仅两三个月，其后任是张里元）。根据我个人的记忆以及贺与其他的反映，那一个时期，晨书堂师的司令部设在沂水城内的盐店内，凡是他们认为有关治安问题的重大案件，都由司令部按军法来处理，杀13个人是由司令部来处理的。因此，不论事情出在那一个任期，都与县长关系不大……。

李钦明

1955·4·2

四、乡农建设。这是梁漱溟的统治人民的一套办法，主张“管教养卫”，韩复榘很欣赏他这种办法，在山东菏泽试点以后，推行各专区。

他的办法是村成立村学，聘请村中有名望的人为学董，是名誉职，定期召开董事会，解决一些大的问题。村学分4个部：儿童部、妇女部、成年部；有知识的编为高级部。

村学设村理事，等于村长，如村中发生纠纷，村理事以老师的身份来处理。村理事解决不了，还有学长（即年高有德的人）。村理事是当家人，学长是后台，出主意想办法，有时起调解作用。除此以外，还有村学的教员，主要推行政令，一般是经过训练，由上级派来的。对学生起教育作用，对理事起辅导作用。

乡有乡学，有理事，有学长和辅导员，它代替行政职务。区有区的乡农学校，一切“管教养卫”都统一于学校，校长等于区长，他的权利很大。

韩复榘推行乡农建设，主要强调“卫”，即利用这种办法实行壮丁训练，六区亦推行这种办法，按地亩多少实行轮训。

五、六区专署内的斗争。七七事变以前，聊城专署内的阶级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一种是CC派的反动势力，以朱香庭为代表。他们想着抓取六区的教育，宣传三民主义，利用推行乡农建设来麻痹

青年的意志。另一种力量是以张墨林、牛连文、赵伊萍（共产党员）、张廉芳为代表，是反乡建、反三民主义，主张依靠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方针。为争夺聊城师范的领导权，斗争达到了最高峰。继聊城师范斗争之后，张墨林、王化云等又组织了“反何思源斗争”（何系山东教育厅长，朱香庭的后台）。待彭雪枫到了聊城，又作了具体指导，增强了斗争的信心。七七事变后，这个斗争才结束。这两次斗争，对鲁西北根据地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

〈编后话〉 作者简介已见第二辑。周云章曾追随范筑先抗日，任参议等职。文革前在任阳谷县政协副主席期间，当时在北京国家体委工作的张维翰（墨林）曾约请周老等有关人员共同撰写关于范筑先及其领导的鲁西北抗日斗争史料，周老应约联络有关人士并积极回忆撰写材料多篇，有时口述请人代笔，当时家住阳谷东街的退休中学教师李子厚和与周老为战友和同事的段惠甫都曾协助周老记录整理并复写，其中一份寄张维翰。张维翰补充修改重新写好后寄回给周老，最后以周云章名义写定。当时，历史研究所的姜克夫先生也曾参与此事。从1963年开始，直至文革中1969年，周老与张维翰等仍未间断此项工作。文革前县一级政协基本上未开展文史资料工作，而周老与张维翰等人实际上即着手了文史资料工作。我们从其子周建宇处征集到了周老这些有价值的遗稿，拟陆续编印出来，以示纪念，并提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